新华每日电讯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草地 周刊
有生命力的阅读

9版
第469期
2020年10月23日

策划/编辑：方立新、谢锐佳、姜锦铭
刘小草、李牧鸣、吉玲、刘晶瑶、陈琰泽

保家卫国笔为枪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新华社记者

7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中，新华社作为唯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建立分支机构的国内新闻单位，共派出了100多位记者、编辑及工作人员赴朝

耳边是隆隆的炮声，头顶是美军侦察机，手中的笔仍在纸上沙沙作响。通过设在“水帘洞”里的前线编辑部，新华社发出大量的消息、通讯和述评，国内民众得以了解战争形势，国际社会得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志愿军战歌歌词是他们“发现”的；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儿女”是他们“发掘”的；有记者甚至还临危指挥了战斗……

他们记录报道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有的入朝24小时就牺牲了，有的在停战协议刚签署后不久倒下了。7位新华社新闻工作者永远留在异国的土地上

70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去，让我们走近朝鲜战场上这群塑造“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者，走近这支以笔为枪保家卫国的“笔墨劲旅”

▲抗美援朝时期，新华社先后派出大批记者赴朝参加新闻报道工作，图为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记者在朝鲜战地合影。前排右起：普金、高向明、何友、陈伯坚、于逢源、朱承修、刘尔宁、何日红；后排右起：崔佳山、刘紫池、殷步实、戴煌、苏群、李方诗、王玉章、成一、徐熊、纪兆璞、曾思明、谢芝麟、丁德润、路云、李翼振。

新華社記者評述朝鮮戰場新勝利

黃繼光捨身炸敵堡掃清進軍道路

▲上甘岭战役期间，国内报纸刊登的新华社部分报道版面。

图片来源：新华社社史馆

本报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七日电……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

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逃至清川江以南。”

这是1950年11月7日，新华社播发的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条电讯，也是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我国第一次公开披露志愿军参战情况的战报。

“新华社这篇《朝人民军在中国志愿部队援助之下已在朝鲜西北部取得重要胜利》电讯消息一出，即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新闻头条，给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军’各参战国极大震动。11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

在新华社社史馆二楼的展厅里，除了上述文字，还摆放着当年电文的手写原稿，战地记者的笔记本、记者证，以及获得的各种军功奖章，还有战场上用过的电文发报机……

在北京佟麟阁路新华社大院的这座古建筑里，不仅陈列着当年新华社记者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相关文物史料，更有刻在烈士墙上的雕像和不朽的名字。

总喜欢过来转转看看的朱承修老人，如今身体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华社后辈记者的采访，90岁的他，思绪沉浸在70年前的峥嵘岁月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华社先后派出陈伯坚等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这是新华社历史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是唯一从总部到各兵团有系统机构的对外报道单位，另一个新闻机构《志愿军报》是部队内部报纸。”朱承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篇。

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笔和镜头记录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新华社发自朝鲜的一条条电文，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程和基本形势，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失败，广为传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始终感召、鼓舞和激励着出征战士和国内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直至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报道，采写播发的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高级编辑万京华，1994年开始从事新华社社史研究，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报道相关研究。她说，“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同时，新华社还分批派出许多报务员、机要员、译电员等赴朝鲜前线工作。”

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其中7位新闻工作者牺牲，100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1992年10月，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的朱承修重返朝鲜桧仓，专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为与自己同批入朝的郭普民、高健飞，以及后来牺牲的刘鸣等烈士献上鲜花，深深鞠躬，并长久伫立。朱承修说：“在那寂静幽深的山谷里，眼望长眠朝鲜战场的同事们，那是一种难言的情感……”

70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去，让我们走近朝鲜战场上这群塑造“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者，走近这支以笔为枪保家卫国的“笔墨劲旅”。

“战歌”是这样唱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出自新华社的报道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1年8月，朱承修和新华社其他记者编辑，像大多数志愿军战士一样，就是唱着这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奔赴朝鲜战场的。而这支激昂铿锵、动人心魄的“战歌”，正是源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采写这篇报道的是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举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悍然轰炸了我国境内的一些村庄。

此时，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陈伯坚已从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调到总社军事组工作。10月2日，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找陈伯坚谈话，告知由于形势的发展，组织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

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安东（今丹东），到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报到。

期间，在某炮兵部队战前动员的采访中，连队墙报上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引起陈伯坚的注意，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在文字上略做了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

很快，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中旬，陈伯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报道。此前在安东部队采访记下的那首诗，始终萦绕在陈伯坚心头。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二十五日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记者在前线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中听到的广泛流传着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自己曾抄录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刊登题目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并将这首诗编排在报纸醒目位置。

报道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于当时报道中并未提及诗的作者，也未署记者名，“战歌”发表初期，词作者署为“志愿军战士”。

“1951年3月，陈伯坚从朝鲜战场回国休整，总政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说要把这首歌曲获奖的一笔奖金发给他。”陈伯坚的夫人胡修亚生前曾对前去采访的万京华说。

原来，工作人员在查询歌词作者时，听当时正在北京的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刘桂梁说，作者可能是陈伯坚，“因为他曾在安东听陈伯坚当面诵读过此诗。”陈伯坚听后赶紧向来人说明，自己不是诗歌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某炮兵部队的连指导员，但部队番号和姓名已不记得了。”正是根据陈伯坚提供的线索，后来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了这首诗的原作者麻扶摇。

敌机下的总分社

敌人扔下的炸弹离新华社编辑部只有几米之遥

“1950年11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道。”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每层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

“武记者”临危指挥战士歼敌

著名军事记者阎吾被误为是指挥员，“将错就错”成功指挥了战斗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三日电 美国骑兵第一师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受到过多次的沉重打击，但是，从来还没有遭到过像最近一次这样惨重的杀伤。在范佛里特的‘秋季攻势’中，骑一师在西线担负自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北犯的主攻任务，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激烈作战，共被杀伤万人以上。在战斗过程中，该师因伤亡惨重曾补充兵员三次。骑一师被俘的官兵垂头丧气地说：‘这是骑一师历史上最黯淡的日子！’……”

这是1951年11月13日播发的新华社记者阎吾的通讯名篇《痛歼美军骑一师》。

被称为“武记者”的阎吾，以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前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创造了我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三个“之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位著名的军事记者曾写下《守卫在汉江前线的志愿军英雄们》《临津江前线的一个顽强的坑道战》《“打破疑虑，坚决回祖国”》等军事新闻名篇。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战地采访中，在指挥员牺牲的情况下，他临危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

那是在一次随军的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指挥员英勇牺牲，而此刻敌军又一次向我军扑来，没有了指挥员，仗还怎么打？

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阎吾身上背着望远镜，误以为他就是指挥员，随即请求阎吾下命令指挥战斗。

作为战地记者，阎吾始终跟随部队，清楚地了解敌人，也知道部队的整个作战意图，并坚信击退敌人，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随后，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阎吾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赴朝参战的新华社记者，不少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地采访经验，他们的骨髓里始终坚信自己就是一名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为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曾经采访接触过不少赴朝记者的万京华说。

光辉的战斗，永远的电文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上甘岭”一词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的代名词

参加过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报道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李翼振曾回忆说：“我们的记者下部队深入采访，与前线年轻战士吃住一起，不怕苦累，不顾生死，甚至前进到离敌阵不远的我军孤守前沿的哨兵岗位，亲切慰问最可爱的战士。”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上甘岭”一词后来在中国长期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的代名词。

采写了《志愿军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等报道的李翼振，曾经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报道，回忆起“上甘岭”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这位老记者曾感慨：“那可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敌人虽然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绝对优势，然而，在志愿军将士们的顽强抗击下，却难以向前推进半步。上甘岭成了美国侵略者的‘伤心岭’。”

新华社记者王玉章在朝鲜前线采访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朝鲜的东线、中线、西线都去过，他曾在回忆中写道：“只有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采访，同战士们在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战士们心连心，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心胸和情怀，才能体察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来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战俘遣返问题一度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曾参加过遣俘报道的高向明，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记者之一。她曾接受采访说，美方在谈判桌上谎称朝中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实行所谓的“自由遣返”，实际上是要用残暴手段扣留大批志愿军战俘。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高向明和记者王殊采写了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美方迫害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等通讯，同敌人的虚假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谈判代表团用报道中提到的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严寒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前线记者染上了疾病。

新华社记者姜庆肇在大德山采访时，与部队战士们一起住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里。不到10天，他就病倒了，腰直不起来，两眼模糊看不清东西，经医生诊断是风湿病和夜盲症，他坚决要求留在团卫生队治疗。

“就是在治疗期间，他仍旧主动向医护人员了解部队伤病员情况，并请卫生队领导同意他每天采访一两位伤病员，根据采访的素材，他趴在两块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写下了反映志愿军战士从来自祖国的家信中获得鼓舞和力量的通讯《家信和喜报》。”万京华说。（下转12版）